

揚州文化與日本

趙昌智

很榮幸參加這次《江南文化與日本》的學術盛會。我想，主人之所以邀請我們與會，大概出於三個方面的考慮：

一、揚州文化是江南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揚州雖然地處長江之北，人們俗稱之謂“江北”，但她所具有的詩性審美精神恰恰是江南文化的本質特徵。我理解，文化意義上的江南並非是自然分割或人為劃分的地理、行政範疇，而是超越自然地理、政治、經濟等實際功利框架的，以人文歷史領域中的詩性審美精神為核心的人文江南¹。

在古人心目中，揚州就是江南，唐代詩人杜牧《寄揚州韓綽判官》“青山隱隱水迢迢，秋盡江南草未凋”，《遣懷》“落魄江南載酒行，楚腰纖細掌中輕，十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幸名”，更是膾炙人口。而清代劉大觀則把杭州、蘇州、揚州三個江南文化的代表性城市放在同一層面作了比較：“杭州以湖山勝，蘇州以市肆勝，揚州以園亭勝。”可見在他的眼中，揚州與蘇、杭二州一樣，同屬於江南文化。

再回顧一下，為什麼唐代許多大詩人都喜歡遊歷揚州，並留下無數名篇佳作？為什麼唐末揚州城市會首先突破坊市制，形成“夜市千燈照碧雲”的繁華景象？為什麼康乾時期眾多具有創新精神的畫家皆會聚揚州，形成與主流畫派相抗衡的“揚州八怪”？為什麼乾嘉時期揚州學派能繼吳、皖而起，成為全國學術中心？為什麼印壇的浙派、徽派的大多數印人都活躍於揚州？除了交通、經濟、政治等諸多因素外，關鍵在於文化的力量，而這個文化便是具有江南特質的文化。研究江南文化與日本，揚州是不可或缺的一個城市。

二、歷史上揚州與日本關係密切

據有關學者研究，從西元630年（唐太宗貞觀四年，日舒明二年）起，到894年（唐昭宗乾寧元年，日寬平六年）264年間，日本共任命過20次遣唐使，實際成行16次，而經從揚州的就有九次。因為揚州是當時與海外通航的重要港口城市之一，也是北上進京的必經之路。而且其時日本遣唐使進長安需獲得朝廷批准，等待批文的最佳地方便是揚州，因為揚州比交、廣、泉三州離京師近，未獲准進京的隨員多半也就在揚州活動。《續日本紀》寶龜九年（774）十月乙未條載有遣唐使第三舶判官小野滋野奏言：“臣滋野等，去寶龜八年六月二十四日，候風入海，七月三日與第一船同到揚州海陵縣，八月二十九日到揚州大都督府。即依式例，安置供給。得觀察使兼長史陳少遊處分。屬祿山亂，常館驛凋敝，入京使人仰限六十人以來，

¹ 參見張興龍《江南都市文化視野中的唐代揚州政治文明》，《江蘇行政學院學報》2009年第三期。

十月十五日臣等八十五人發州入京。行百餘里，忽據中書門下牒，樽節人數，限以二十人。臣等請更加四十三人，持節副使小野朝臣石根、副使大神朝臣末足、准判官羽栗臣翼、錄事上毛野公大川、韓國連源等四十三人。”經考查，這次應屬日派出的第十六次遣唐使，是實際成行的第十三次。寶龜六年即任命了大使、副使，因大使佐伯今毛人生病多次推遲發船時間，直到寶龜八年才發船，而今毛人卒未成行，所以此行只有副使，得到了觀察使兼長史陳少遊接待安排²。一般來講，使團人數早期240多人，後期則在500人左右。而朝廷只批准六十人，走了百餘里應該還沒有出揚州地界，又接牒文，限以二十人。試想，日本使團有大使、副使、判官、錄事等官員，還有譯員、醫師、畫師等等，限得太嚴顯然安排不了，最終去了43人。那麼剩下的400多人，只能留在揚州了。

也就是這一次遣唐使團活動中，還發生了一件有趣的事。使團中的准判官羽栗翼，此行入唐負有特殊使命，十年前，即日本天平神護二年（766）七月，有個下級官吏昆解宮成從丹波國天田郡獲得一塊酷似“白鑛”（錫、鋁合金，熔點低，可以制器）之物，聲稱不亞於“唐錫”，並向朝廷獻上自稱用此物鑄造的銅鏡。這一發現非同小可，有礦物能夠取代進口唐錫了。昆解宮成因此官升幾級，由從七位上一躍至外從五位下。然而當朝廷大舉採礦、依法鑄造時，卻不見成功，有人懷疑有詐，而宮成不服。所以，命羽栗翼攜帶此物入唐請中國工匠作出權威性鑒定。《續日本紀》云：“以示揚州鑄工。僉曰：‘是鈍隱也。此間私鑄濫錢者，時或用之。’”³這件在日本爭論不休、懸而未決的公案，揚州工匠一眼就辨別出來了。因為當時的揚州，鑄造銅鏡的技術高超，《資治通鑿》卷一八三載，早在隋代，江都郡丞王世充就曾向煬帝獻銅鏡屏風。張鷟《朝野僉載》云：“中宗令揚州造方丈鏡，鑄銅為桂樹，金花銀葉，帝每騎馬自照，人馬並在鏡中，專知官高郵令幼臨也。”唐詩多有詠揚州銅鏡者，如韋應物《感鏡》“鑄鏡廣陵市，菱花鏡中發”（《全唐詩》卷一九一）；張籍《白頭吟》“揚州青銅作明鏡，暗中持照不見影”（《全唐詩》卷三八二）。唐玄宗曾在生日時贈群臣銅鏡，並以詩紀之：“鑄得千秋鏡，光生百煉金。分將賜群后，遇象見清心。臺上冰華澈，窗中月影臨。更銜長綬舉，留意感人深。”（《全唐詩》卷三）鑒真第一次東渡所攜物品中，即有大銅盂四口，大銅盤二十面，小銅盤四十四面，一尺銅疊八十面，小銅疊三百面。可見揚州銅鏡等青銅器鑄造技術是朝野皆知、遐邇聞名的。在很多傳聞中已帶有神話色彩了。所以羽栗翼帶酷肖“白鑛”之物來揚鑒別真偽是不二之選。再一點，當時揚州鑄錢業十分發達。揚州鑄錢業始於漢吳王劉濞。開皇十年，詔晉王楊廣於揚州立五爐鑄錢。江淮既為重要鑄錢區，老百姓也利用有利的地理優勢，私鑄不休。武則天時，“江、淮之南，盜鑄者或就陂湖、巨海、深山之中，波濤險峻，人跡罕到，州縣莫能禁約”⁴。天寶後期，官府以高報酬召募工匠鑄錢。天下鑄錢爐共九十九座，揚州十座，“每爐歲鑄錢三千三百緡，役丁匠三十，費銅二萬一千二百斤，鑛三千七百斤，

² 據《舊唐書》卷一一《代宗紀》大曆八年條載：“冬十月，以浙東觀察使、越州刺史陳少遊為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充淮南節度使。”又據《文苑英華》卷五八四、《全唐文》卷三九五收劉太真《陳大夫（指陳少遊）謝上淮南節度使表》中云：“臣即以今月（十月）二十五日發赴揚州，其浙東使事，已差殿中侍御史盧翰權知留後。”可見《續日本紀》中有兩點值得注意：一是陳少遊為揚大都督府長史、淮南節度使，稱其為觀察使兼長史，不妥；二是陳少遊稱十月二十五日發赴揚州，小野滋野等十月十五日已發州入京，時間有訛錯。似以《全唐文》、《文苑英華》為準。

³ 轉引自王勇、中西進主編《中日文化交流史古系·人物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12月第一版，206頁。

⁴ 《舊唐書》卷四八《食貨志上》。

錫五百斤。每千錢費錢七百五十，天下歲鑄三十二萬七千緡”⁵。正因為有這麼一個背景，所以羽栗翼一出示礦物，便被揚州鑄工認出“是鈍隱也”。這應該算作揚州與日交往的一段趣事。

有學者推算，遣唐使總人數可能逾6000人，至少不下5000人，那麼經行揚州的則應有3000人左右，至少一兩個月時間，而且有些不能進京的在揚州逗留時間會更長。其中，藤原清河、吉備真備、榮睿、普照、空海、阿倍仲麻呂與揚州的關係更為密切。

明代，揚州天寧寺有高僧道彝，字天倫，戒行精專，博通內典，洪武年間曾任府僧綱司都綱，永樂中奉使日本，卒于其國。臨終作謁曰：“來不為多，去不為少，六十六年，一了便了。”

從明初到清初，揚州都是日本、琉球等國來華朝貢的經行之地。琉球國凡王嗣位，先請朝命，欽命正副使奉敕往封，賜以駝鈕鍍金銀印，乃稱王。未封以前稱世子，權國事。康熙二十一年，命翰林院檢討汪楫、內閣中書林麟焄為正副使，齎詔敕銀印往封琉球國世子應貞為王，賜御書“中山世土”額。這在當時是一件轟動朝野的大事，天子“賜一品服，繡以麒麟，而加之尚中之尊中台八座，自國門升車，旌旗獵獵前導，關亭負弩者踵相望于路。上既慰勞出，而在朝諸臣並為之供張，贈以詩歌”⁶。汪楫原籍安徽休寧，後遷居揚州。這次奉使琉球，他盡心盡職，朝拜命夕就道，“有言必以誠告，有事必以實應”，聲名播於屬國。逾年返命，撰《使琉球錄》若干卷，《中山沿革志》又若干卷，“其搜輯也備，其據依也詳，上之可作輶軒之指南，次之可備史家之筆削，最下亦可為四方士大夫考異聞、述荒怪之一助”⁷。

晚清黎庶昌為駐日公使時，曾延請著名版本學家楊守敬在日搜集古籍，多得唐、宋善本，刻成《古逸叢書》。現這套書的全部版片均藏在揚州中國雕刻印刷博物館內，版片為日本櫻花木，也系日本雕工雕制。田中角榮訪華時，毛澤東曾以《古逸叢書》所收《楚辭集注》的原版印刷一套相贈，這也是揚州與日本文化交流中的一段佳話。現在揚州雕版印刷技術已成功申報聯合國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

1981年2月24日，揚州邗江一個農民在甘泉山田間勞作時無意中發現一顆金印，金質，正方形，龜紐，重123克，陰刻篆文“廣陵王璽”四字，經專家鑒定，為東漢初廣陵王劉荆所佩物。這顆印的出土還解決了日本考古界長期爭論的一個問題。日本天明四年（1784）二月，志賀島農民掘地時獲得一枚金印，文曰“漢委奴國王”。金印于史有考，《後漢書·光武帝紀》云，二年“東夷倭奴國主遣使奉獻”，《東夷列傳》云“建武中元二年，倭奴國奉貢朝賀，使人自稱大夫，倭國之極南界也。光武賜以印綬”。但日本學界有人認為，此印系倭國自製，非漢光武帝所頒；還有人認為是江戶時期偽造的。直到“廣陵王璽”出土，兩相對照，真相大白：

1、授印時間相近。“漢委奴國王”印建武中元二年二月授。二月，光武帝駕崩，明帝即位，次年改元永平，“廣陵王璽”永平元年授，時間僅差一年。

2、印製相似。據《後漢書·輿服志》同姓王與藩國王印製相同，金印。鈕不同，諸侯王龜紐，藩國印為蛇紐；印文格式略有區別，對藩國前冠以“漢”字。

3、風格相同。印面均豐滿勻稱，線條平正流暢，起結處棱角分明，兩印惟妙惟肖，幾

⁵ 《新唐書》卷五四《食貨志》。

⁶ 毛奇齡：《送汪翰林奉使琉球序》（《西河合集序》十七），轉引自清焦循輯《揚州足徵錄》，許衛平點校，廣陵書社，2004年9月版，350-351頁。

⁷ 汪琬：《使琉球錄序》（《堯峰文鈔》卷二十八），轉引自清焦循輯《揚州足徵錄》，273頁。

出一人之手。

至此，一場爭論結束，日本對“漢委奴國王”印極為重視，定為國家文物，現藏於日本福岡縣博物館。兩顆金印在冥冥之中把二千多年前的揚州與日本連接起來了。

筆者對揚州與日本的交往未作過詳盡的考證研究，僅從上述所舉數例，即可看出，說歷史上揚州與日本的友好關係就十分密切，應非虛語。

三、鑒真所締造的揚州與日本的友好關係正在發揚光大

揚州與日本關係最具代表性的人物還是唐大和尚鑒真。天寶元年（742）日僧榮睿、普照到揚州大明寺拜見鑒真，請鑒真赴日本弘法。從天寶二年（743）到天寶十三載（754），鑒真出生入死，六次東渡，歷十二年，終於到達日本，不僅對日本佛教的發展做出卓越的貢獻，而且對日本的藝術、建築、醫藥等事業都帶來重要影響。鑒真已成為中日文化交流的象徵。鑒真所締造的中日友誼也在不斷發揚光大。

1963年鑒真逝世一千二百周年，中日兩國的佛教、文化藝術、醫藥衛生界人士，分別在北京、揚州、奈良隆重舉行紀念活動，盛況空前。揚州在大明寺舉行了鑒真紀念堂奠基儀式。紀念堂由梁思成先生主持設計，唐代風格，1973年落成。堂前置放石碑，正面刻著郭沫若所書“唐大和尚鑒真紀念碑”，背面刻著趙朴初撰書的碑文。

1980年，鑒真坐像回國探親，在揚州引起極大轟動。4月14日，日本奈良唐招提寺住持森本孝順長老一行護送鑒真大師坐像到上海，中國佛教協會會長趙朴初親往迎接。18日，坐像抵達揚州，江蘇省暨揚州市各界人士千余人隆重集會歡迎。19日，在大明寺舉行鑒真大師像回故鄉——揚州巡展開幕式和森木長老贈送的石燈籠安放點火儀式。鑒真坐像巡展25日結束，短短幾天，前往參觀者達20萬人次。

2008年5月上旬，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訪問日本時，揚州市組織了近120人的“鑒真故里——揚州市民訪親團”赴日本奈良市訪問。揚州漆器廠製作了“友誼之舟”船模作為國禮，由胡主席親自揭幕，贈送給唐招提寺。揚州文藝家們在日方歡迎胡主席的國宴上表演了揚州民歌、古箏演奏。在奈良舉辦了“鑒真精神論壇”、市民拜謁鑒真坐像、揚州書畫剪紙雕版印刷木偶表演等文化展示、以及聯歡晚會等多項活動，深受日本市民歡迎。11月10日-12日，日本奈良市市長藤原昭一行來揚訪問。

2009年4月，在揚州與日本厚木市結好25周年之際，舉辦了兩市市長共同簽署的“科技創新、人才交流”備忘錄等活動。5月，日本奈良縣知縣一行應邀來揚。8月25日-27日，“第八屆中日地方交流促進研討會”在揚州舉行，會議以地方政府如何應對世界金融危機的影響為議題，旨在為中日兩國地方提供決策參考。10月14日-17日，“第五屆中日韓文化交流論壇”在揚州拉開帷幕，這次首次在北京以外城市舉辦。期間，還舉行了佛教論壇、祈禱大會、書法筆會、中日韓歌會等活動，展現了濃厚的東亞文化特色。

2010年5月23日，揚州與奈良這兩個由鑒真聯繫起來的城市簽署了締結友好城關係協議書。同年，揚州舉辦了鑒真大師像回揚省親30周年暨二次來揚探親慶典活動。中國中央電視臺、鳳凰衛視對活動進行了現場直播，人民日報、新華社、中新社以及日本朝日新聞、日本NHK電視臺等國內外媒體，對活動盛況進行了報導。2010年是日本奈良遷都1300周年紀念。10月31日，揚州與中華文化發展基金會聯手在日本奈良豎立揚州鑒真紀念堂設計者、著名建築學家梁思成紀念銅像。

2011年，揚州連續第六次舉辦鑒真國際半程馬拉松賽。揚州鑒真馬拉松賽事，是國際馬拉松賽上第一個以人名命名的賽事，是中國國內唯一的國際田聯半程馬拉松銀牌賽事，是首批中國體育旅遊精品推薦項目。馬拉松运动絕不言棄的精神與鑒真大師六次東渡的堅韌執著精神深度契合，彰顯了揚州鮮明的城市特色。

現在揚州有鑒真圖書館、鑒真佛學院等等，鑒真已成為揚州對外文化交流的一個象徵。

揚州有着二千五百年歷史，文化底蘊深厚，與國內許多重要城市乃至日本、韓國、波斯等國有着密切交往，文化的接受力與輻射力都很強烈，值得研究的內容很多，目前我們知之不多甚至未知的領域也不少，我們真誠地希望得到海內外專家的支持與指點。